

戊戌维新

——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

● 范士华

求实出版社

戊戌维新

——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

● 范士华

求实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旭畅

封面设计：张志明

戊 戌 维 新

——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

范士华

*

求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下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75印张 14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7-80033-036-2/K·13

定价：1.50元

目 录

第一章 维新运动所处的时代	(1)
一、高度集中的专制皇权演变而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政权	(1)
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	(10)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	(15)
第二章 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纲领	(25)
一、“要维新、只有学习外国”	(25)
二、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	(34)
三、维新运动的政治纲领和日本模式	(42)
第三章 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开展	(49)
一、公车上书成为维新运动的起点	(49)
二、维新运动的派别	(52)
三、维新运动的开展	(60)
第四章 新政改革	(76)
一、光绪皇帝	(76)
二、政治改革	(90)
三、经济改革	(111)
四、文化教育改革	(123)
五、军事改革	(140)

第五章 戊戌政变	(144)
一、新旧势力的斗争	(144)
二、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	(164)
第六章 维新思潮	(171)
一、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对抗君权神授 论和君主专制制度	(177)
二、以西学对抗中学、以新学对抗旧学	(184)
三、以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思想对抗帝 国主义、封建势力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	(193)
四、以进化论和庸俗进化论对抗“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封建顽固思想	(199)
第七章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意义	(208)
一、从德国、俄国、日本的历史对比中看维新运动的 失败	(208)
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237)

第一章 维新运动所处的时代

1895年至1898年，中国发生了一场颇有声势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其高潮是1898年的百日维新。这是一次资产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年是甲子纪年的戊戌年，所以通常称为戊戌维新运动或戊戌变法。

戊戌维新运动发生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已具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这就是：明清两朝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原封未动地保存下来，并与外国侵略势力相结合，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政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全国范围内仍居统治地位，而在沿江沿海城市则出现了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使中国社会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一、高度集中的专制皇权演变而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政权

中国早在二千年前就由地主阶级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在牢固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形成完整、严密的封建政治体制，

即封建官僚机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这种体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①这就是地主阶级建立的国家机器。皇权专制制度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到尽头。这是因为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一方面，掌握国家政权的地主阶级已经没落，其因循保守、愚昧腐朽的特性，发展到了极端；另一方面，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要求改造社会，他们反封建的斗争日益尖锐。为维护其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这个封建国家便日益加强其专制和镇压的职能。

明清两朝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表现在皇帝“刚乾独断”、专制独裁、权威无限，彻底扫除了封建社会中宰相制度的残余。明清以前的国家体制设有宰相，宰相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皇帝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劝谏、限制以至批评皇帝的某些作为。明清时期，为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而取消了宰相，虽有内阁处理政务，但在内阁之上还没有一个皇帝的御用机构。这个机构在清朝顺治时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时为南书房，雍正时为军机处。尤其是乾隆二年复设军机处之后，该机构草拟诏书，下达圣谕，“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如升革文武官员，审理重大案件，制定大典礼节，查考兵马钱粮等等。它本身没有独立性，绝对听命于皇帝，实际上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处权力的增强是皇权集中的表现。这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87页。

时“内阁宰辅，名存而已”，形同虚设，并不起什么作用。

官僚机构是清朝极端皇权专制统治的组成部分。清王朝为了集权于皇帝，在政权机构上最突出的措施就是使机构繁杂。清朝中央行政机构设立六部。六部之中，吏部列在首位。名义上，吏部负责官吏的任免，但实际上任命大官的权力出自皇帝，吏部只是办理文官任免的手续而已。礼部掌管国家的典礼、学校、科举，但在礼部之外，又设主管礼乐、宾宴、赞导的光禄寺、太常寺、鸿胪寺等。刑部管理全国刑法案件，但管理刑法的还有都察院、大理寺。在掌管论撰文史的翰林院之外，又设职权相似的詹事府。行政机构重重叠叠，职责不清，使一件政事分派几个机关办理，互相牵制。为集权于皇帝，清朝在官员的职责安排上最主要的措施就是使一人兼数职，一职任数人，形成人无专职，事无专责的局面。大小官员谁也不能独立办一件事，任何一件事也无法责成专人负责。中央六部长官的职权受很大的限制，他们无权向地方官直接发布命令，只能奏请皇帝颁发诏谕。尚书和侍郎间如有争执，均可单独上奏，听候皇帝裁决。地方上，总督和巡抚的职权也是互相制约的。总督是二省或三省的军政长官。巡抚虽管一省的政务，但一般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且多兼兵部侍郎衔，也成为地方的军政大员，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并不受总督的节制。通过上述措施，皇帝掌握官僚机器的运转，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人，包括各级官吏，都匍伏在他的权威之下。

叠床架屋的各级官僚机构和充塞满朝的冗官冗员必然造

成因循守旧、腐败昏庸的作风。这是官僚政治的显著特点。“大臣任意因循，小臣效尤玩滞”，互相推诿，内外观望，加上律例繁琐，动则获咎，于是形成往复呈咨，无人负责的局面。贪污、纳贿是官僚政治的产物。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更有甚者，莫过于使这种纳贿形成制度。清初顺治时，已有士人“纳粟入监”，但不能得官。康熙时，为平“三藩”叛乱，开捐纳以补充军费，三年内捐纳的知县达五百多人。后来逐渐形成“捐纳”制度。外省文职可由监生捐至道员，武职可由武生捐至游击，各级官品均定有捐价。这是清朝腐败政治的一大表现。有人说：“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①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卖官鬻爵的制度经久不衰。道光以后有大捐和常捐之分，由虚衔进而实官，由知县、知府进而金道。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戊戌维新运动发生时仍然公行。

专制皇权的高度集中使皇权无处不在而言路堵塞。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政务皆决策于皇帝一人，能向皇帝上言的，一省之内只有总督、巡抚、将军、都统等数人，“京师百寮千万……而惟九卿、台谏方能上达，”^②造成“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大臣与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的局面。^③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大

① 冯桂芬：《改捐例议》，《校邠庐抗议》第19页。

② 《上清帝第七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19页。

③ 《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34页。

小臣僚也不能充分发表意见，与皇帝商办政务。皇帝个人意志和情感受不到丝毫约束，动辄酿成全国的灾祸，社会一片黑暗。

清朝承袭明朝的制度，不同的是清朝是由满族贵族掌握政权。它为保持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而采取了两大措施。其一是官职的复职制。中央军机大臣、大学士到各个部都是一职二员。如各部尚书二人，满汉各一，侍郎四人，满汉各二，甚至象军机章京（办理文书的人）这样的办事人员也是满汉对等；同时规定，同职的满族官员的官品、职权高于汉人。其二是八旗旗人世代为兵，由国家供给俸禄，并拥有固定的旗田。结果，旗人成为不事生产而由国家豢养的特权阶层。清朝前期八旗兵还能射箭习武、建立武功，到了后期，八旗子弟成为一批即不习武、又不生产的纨绔子弟，蜕变为附着在国家机体上的寄生虫。由此看来，清王朝不仅是君主专制的政权，而且是具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政权，其统治更为野蛮、专制。

极度专权的封建君主制导致了官僚政治的腐败。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近代的前夕，即清朝的嘉庆、道光年间，已经险象横生。政治上极端黑暗腐朽，整个官僚机器失灵，各级官吏昏聩无能，他们只知道做官的诀窍，即“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全不顾民生的艰难。整个统治阶级，从皇帝、大臣、各级官吏以至土豪劣绅都穷奢极欲、贪污成风。乾隆的权臣和珅到嘉庆初年被抄家时，其家产竟值八亿两银，相当于清政府十年的国库收入。嘉庆时，因贪污被斩的湖南藩司

郑源琦，在衙署安插有家属四百多人之外，又养两个戏班“争奇斗巧，昼夜不息。”道光时的闽浙总督颜伯焘罢官回乡，随从夫役之多，简直如同一支军队，路过漳州时有人看到，十天之内，每天有六、七百名杠夫抬着细软物件过境。道光时一个陕西的粮道官员，一年之内就搜刮到民脂民膏三、四十万两银。当时，不仅大官僚家婢奴成群，就是州县地方官，也是“多置僮仆以逞豪华……一署之内，几至百人。”

极端专权君主制和官僚政治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权臣显贵不以贪污、纳贿为满足，还大肆兼并土地，占田“有以万计者，有以千计者，”^①有“分列数县版图”^②者。“大抵豪家巨族，田连阡陌，盈千累万。”^③长沙县地主李象鵬在1812年收租不过“六百余石”，后来做了官，便广置田产，1840年“即达万余石田”。^④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大量农民贫困破产，沦为佃农。嘉庆时农民已是“其得以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之焉。”^⑤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的危机。

清朝满族贵族的封建政权为镇压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极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经过康熙、乾隆长达一百二十多年的文字狱之后，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只能奉行，不许言议”。

① 《光绪吴江县志》第19卷《人物》。

② 《光绪苏州府志》第13卷《田赋》。

③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第1卷。

④ 李象鵬：《橡怀堂随笔》。

⑤ 章谦：《积伍论》上，《清朝读文献通考》第60卷。

清王朝又用编纂古籍、科举八股手段把知识分子束缚在考据帖括、经文学的圈子里，学术思想界一片沉寂。

总之，在极端君主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近代的前夕，已经呈现出衰败的景象，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①

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外国列强用炮舰扣关，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皇权专制的封建政权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与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并逐步受资本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政权。这个过程起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经过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边疆的一系列冲突、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清政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逐渐加深。

甲午战后的清政府已经成为丧家之犬，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在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清政府对列强的需索更是有求必应，与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使国家，而且连同清政府在内，从政治、财政到经济上处处受列强的操纵，致使清政权，完全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政权。

清政府为了偿付对日本的巨额赔款，向人民敲骨吸髓，大肆搜刮。甲午战前，清政府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供养皇室、

①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4页。

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财政收支大体平衡。甲午战后，平衡被打破了。清政府于 1895 年、1896 年和 1898 年三次对外大借款，为此，从 1896 年起每年要支付外债本息二千万两银，1898 年增为二千五百万两银。这项约占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额外开支造成了清政府入不敷出的局面，国家出现了财政危机。另外，清政府为了改变自己在战争中的可耻形象，便在甲午战后编练新军，如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张之洞编练江南自强军，又命各省督抚用洋枪洋炮编练军队。编练新军又需要一大笔财政开支，更加深了财政危机，国家财政日益呈现出破产的征象。与此同时，清政府还继续支付巨额的洋务经费，这项开支每年达二千万两银。总之，外债、军费、洋务是当时清政府的三大支出，“近今之大费有三，曰军饷、曰洋务、曰息债。”^①如何解决因大量支付而造成的财政危机呢？不外是把沉重的负担转嫁给人民。清政府在甲午战后的苛捐杂税比正供往往多达十倍。田赋就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当时户部在筹集款项十项措施中的头一招就是“考核钱粮”。所谓考核钱粮无非是巧立名目增加田赋收入。增加厘金也是搜刮民财的重要渠道。仅江西一省，征收厘金的关卡就多达七十余处。人民生活所需的日用品每过一卡就得交一次厘金。厘金税率原为百分之一，后来竟高达百分之二十。户部搜刮钱财的措施除“考核钱粮、整顿厘金”之外，还以“茶、糖、盐、烟、酒之加征及土药、典当

^① 转引自周伯揀：《中国财政史》第 463 页。

各店铺之认捐次之。”^①盐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由原来每斤十六文钱加价二文。这种利析秋毫的盘剥成为商人和人民群众的沉重负担，陕西省仅此一项盐的加价就造成四十余家商店倒闭。再如烟酒税，山西省于1896年开征，到1900年，每年仅这两项捐税就达银二十多万两。当铺税则规定从1897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缴纳税银五十两”，总计一年可增收三十多万两。清政府在加重税收之外，又用举借内债的办法搜刮民财，于1895年发放“息借商款”，1898年发行“昭信股票”。在发放过程中，各级官吏乘机“威吓刑驱，多方逼抑，”^②搞得怨声载道。原定“昭信股票”发行一万万两，结果只搜刮到一千万两就被迫停止发行。

人民在繁重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承担封建差徭。清朝在形式上用征收“地丁”代替差徭，实际上人民仍被迫从事各种劳役。例如直隶省一个官员在1895年的奏折中就说：“直隶省差徭之繁重甲于天下，常年杂差民力已苦不支，去岁兵差络绎，州县横敛暴征，而民愈不堪命矣。”这种封建差徭竟至到了民不聊生的程度，“久供差徭，必至车敝马斃而后已。”^③

除此之外，再加上连年天灾。1895年至1898年，水、旱、虫、雹等灾遍及全国。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是水、旱灾。由于官吏侵吞治河经费，河道年久失修，造成长江、黄河、汉水、淮河常常决口，逼迫人民群众在死亡线上挣扎。

① 朱寿朋：《东华续录》第131卷第15页。

② 同上第124卷第15页。

③ 同上第128卷第7页。

1897年春，湖北沙市饥饿死亡的，每天有一、二百人。1898年，淮、徐饥民过扬州，遗尸几百具。逃荒的饥民卖儿卖女，卖价五十文到一千文，惨不忍睹。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状况。

由专制皇权演变而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清朝政权，既有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又有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独裁统治。它代表了最反动的政治势力和最落后的生产关系，成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尤其当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之后，这种反动的上层建筑起了压抑甚至窒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的作用，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前进。

二、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

中日甲午战争及其战后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面临深重的灾难。甲午战争爆发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列强“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当时列强争夺殖民地的疯狂性，正如列宁转引德里奥所说的那样：“近年来世界上所有未被占据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都被欧洲和北美的列强占据了。……大家都得急急忙忙地干：凡是没有及时得到一份的国家，就可能永远得不到它的一份……所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以近来全欧洲和美国都充满了扩张殖民地，实行‘帝国主义’的狂热，而‘帝国主义’就是十九世纪末最显著的特点。”^①十九世纪末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基本上被列强分割完毕，只有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尚处在半殖民地形成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被瓜分，这就使得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对象和矛盾斗争的焦点。在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争夺和角逐中，后起的日本充当了急先锋。日本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虽然是为了开辟国外市场和攫取工业原料，并企图用掠夺邻国的手段达到原始积累的目的，但是，这场战争爆发在世界帝国主义竞相争夺殖民地的时期，因此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从此开始了帝国主义侵华的新阶段。日本在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采取先发制人、偷袭、速战速决等一系列手法：甲午战争之前先设外交圈套，又在丰岛偷袭中国海军和突然进攻牙山的中国陆军，然后才正式宣战。日本继丰岛海战和牙山战役后，又发动平壤战役、黄海海战、旅大战役、威海卫战役及辽东战役，仅仅九个月时间，造成中国几十万陆军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失败结局，最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划时代的影响，它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的阶段。在中国长达一百一十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至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306页。

1894年甲午战前的五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个时期，列强侵华以商品输出为主。他们强迫清政府开辟通商口岸，夺取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运，把持中国海关，向中国倾销了大量商品和掠夺了丰富的原料，从而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1895年中日甲午战后至1949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为第二阶段。这个时期，列强侵华以资本输出为主。由此可见，中日甲午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推向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马关条约》明文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①各列强利用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特权攫取了与日本同等的在中国设厂制造的权利。自此以后，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办工厂、修铁路、开矿产、设银行以及发放政治贷款等，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甲午战前，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不过二、三亿美元，甲午战后至1902年则高达十五亿美元，相当于战前的五至八倍。列强在甲午战后的资本输出不只是数量的激增，更严重的是，帝国主义并不以攫取经济利益为满足，而是通过投资，操纵中国的政治、经济。例如，列强通过政治贷款控制中国的财政。清政府为偿付日本二亿两银的战争赔款，曾在甲午战后举行三次对外大借款，总额达三亿两银。这些借款利息高、折扣大，并要求以关税、盐税作抵押。清政府的年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主要来源于关税、盐税、厘金、田赋、矿税。关税年收入二

^①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16页。